

一名共产党员学生眼中的黄埔军校

——以《张隐韬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石 慧

【摘 要】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开办的学校，对国民革命的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黄埔一期生、早期中共党员，张隐韬留下的个人日记，详细记载了黄埔早期招考和他在黄埔一期学习、训练及生活的实况，乃至对广州商团事变的个人观察，极具历史价值。从张隐韬的视角，可以看到兼具学生和早期共产党员身份的人眼中的黄埔军校。

【关键词】黄埔军校；张隐韬；第一次国共合作；广州商团事变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5-0088-11

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创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受到学者关注，对军校的创办、主要领导者和军校的关系、军校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与军校的关系等问题已有深入研究，但是较为缺乏关于军校具体训练及生活的专门研究。^①本文主要利用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张隐韬^②的日记，对黄埔军校的招考和学员的学习、训练、生活及其对相关重大事件的亲身观察再作梳理，以期深化对于黄埔军校及大革命史的研究。

一、报考军校

张隐韬是河北南皮人。当时国民党在北方缺乏组织，因此多由共产党组织挑选人员应考，采取的是秘密招考方式。在京津冀地区活动的张隐韬就是临时得到中共组织的讯息，匆忙南下应考的。1924年3月10日张隐韬的日记中写道，他到北京见到时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何孟雄，何告诉他：“每

^① 关于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回忆性的文史资料和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季云飞：《黄埔训练时期蒋介石治军思想探讨》，《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李翔：《模铸革命先进——论黄埔军校思想教育方式（1924—1925）》，《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樊学庆：《李大钊选送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情况考订》，《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曾庆榴：《黄埔军校史（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等。另外，曾庆榴的《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部分章节用到张隐韬日记，不过论述的侧重点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和黄埔军校的关系。

^② 张隐韬（1902—1926），河北南皮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参加京汉铁路总罢工。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生。1925年编入黄埔军校学生军军官教导团。同年于黄埔军校毕业后回到北方，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二师四旅副旅长。11月任津南农民自卫军司令。1926年2月，带领农民自卫军由南皮挥师北上失利，被俘后就义。

省要军官学生十五人，但仅有四人，定明晨起程，不知你的意思去不去？时间已迫，能否速行筹备，一同去粤？”“我闻此消息，亦大为荒〔慌〕张。遂急至王励斋处取了介绍信，拟明晨去津永滋处，借路费去沪。”日记中提到的“王励斋”，当为王励斋，即时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委员王法勤；而“永滋”即于树德。1922年于树德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天津党小组组长。1923年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并出席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此时已返回北方开展工作。张隐韬本来是要和母亲一起回老家处理家务的，得此消息后便无暇顾及，他在日记中写道：“晚，至新平我母处，使其急回里，办理家务，我一定去粤入学，不能旅里。”^① 11日上午，张隐韬便赶到天津面见于树德，“与谈去军校事。伊颇赞成我之去粤，并加很多奖励语，谈其在粤之开会经过，付我川资十八元”^②。12日，张隐韬从天津启程，“去总站上十点火车，与杨其纲兄相逢。转识江镇寰兄，便同车南下”。13日，“下午五时，至浦口渡江（扬子江）……晚十一时，乘特别快车去上海”。^③ 14日一早赶到上海，张隐韬便马不停蹄去环龙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探询军校招考信息。见到参与招考工作的毛泽东，“毛泽东君谓已考过一次，你们来迟〔了〕，须暂待两日，听本部的通知”^④。

张隐韬抵达上海后，便去访朋问友，其日记载：3月15日，“去上海大学访中夏兄，路遇荷波及章龙兄，稍谈即别。晚间，章龙去我寓所谈话，我问其补考可否？伊答：须于明日交涉，因军校事伊不负责。略谈北地近情”。16日，“去访张继先生，畅谈直隶之近日情形，教育、工业各项，并谈西北运动之经过。伊亦极谓该方运动，实关重要等语”^⑤。

几天后，张隐韬等人的经费出现问题。临出发前于树德给的18元川资，支付了由北京到上海的火车票后，已所剩无几。当时，从北京到上海，需要先到天津，在天津乘津浦线火车到南京江北，再从南京乘宁沪线到上海。查询1924年的铁路票价可知，从天津到南京的三等座票价是13.7元，南京到上海的三等座票价是2.39元^⑥，18元的资费很快告罄。

张隐韬等人只好去找负责招考人员交涉。3月18日，张隐韬记道：“我等去44号，与孙铁人（负考试之责者）严重交涉，务必得一完善结果，并必要先解决我等目下之经济问题，到执行部后，孙故推脱不见。”无奈之下，只能寻求同乡张继的帮助，此时张继刚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不久，1923年他曾担任国民党北京支部部长。张隐韬当天的日记中记道：“晚间，复到张继先生处，关于我们的情形，请他给我们设法。伊谓：明日代我等与孙交涉。惟不知其交涉之效果如何耳？”^⑦ 19日，“因川资用完，遂伊〔移〕居章龙同志处。吃饭一节，遂〔随〕意到街上去吃，每人每顿之饭资均不过二十枚铜子，经济上便大感痛苦”。在此情况下，他们只好又找张继探询交涉结果，张继答复：“我已同考试委员谈及你们的经济情形，要教〔叫〕执行部每人借你们一点小款，待考试后再

^①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三）》，1924年3月10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第72页。

^②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三）》，1924年3月11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第72页。

^③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三）》，1924年3月12、13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第72页。

^④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三）》，1924年3月14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第72页。

^⑤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三）》，1924年3月15、16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第72页。

^⑥ 交通部铁路联运事务处清算所编：《国有铁路旅客联运价目表汇编》，1924年内部编印，第20~21、26页。

^⑦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三）》，1924年3月18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第73页。

决定一切。但执行部不敢开此一端，恐各学生效尤，则无法应付也。为今时之计，鄙人可以暂担任一笔款子，以救诸位之目下之急。”^①

报考学生到上海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要先组织一次复试。由于自身处境艰难，张隐韬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招考工作颇有微词，他埋怨道：“我们为考军官学校，不远几千里而来此，经济上早就用尽，感无穷之贫困。惟望上海执行部早日考试，领川资去粤。负责人一味延拖，终不能有明了之表示。……我们已到沪十许天，生活几乎不能再往下维持，每餐仅用铜元十余枚。这种生活状况，他们执行部的这些该死的东西那〔哪〕能得知，凡抱革命精神的人，也有作事这样摆架子的？”他还把矛头直指负责招考的孙铁人，认为“民党之改组，须从根本淘汰。把这些旧习不改的东西——如孙铁人等，都革去才是”，甚至感慨“民党虽经一次改组，但内中之官僚式的无革命精神的人，尚是多的很”。^②

张隐韬等人因经费用尽心情急迫，但招考一方也有自己的考虑。事实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招考工作在2月底即已启动。3月12日，在上海大学举行新生录取考试，应考者173人，实际录取130人。由于各地报考学生又陆续抵达上海，执行部遂决定在3月底之前安排一次补考。3月20日补考报名截止，报名补考的考生共计264人。执行部之所以一再放宽期限，是想尽可能照顾到各地考生，使更多的人可以参加补考。3月23日，在上海中华路勤业女子师范学校举行补考。即便如此，陕西籍考生杜聿明等还是没有赶上补考，后经于右任出面给蒋介石写信推荐，方得录取。

在此期间，广东方面一直关注着上海的招考情况。陈果夫后来说：“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上海招生的时候，校长不过要我担任转汇经费及电告各方的情形。”^③围绕着上海招考，校方内部有过沟通。廖仲恺致电蒋介石称：“闻沪取学生百卅人外，尚续取七十名，果尔，则将来到粤复试，不及格者必多。资遣往返，亦嫌糜费，请妥为斟酌。”^④对此，蒋介石回复：“取录学生，宜以各省定额为标准，北人以多取为是，虽程度略低，亦希降格求之。将来教课，可分初、高二级，学期亦可斟酌损益。”^⑤这也进一步印证军校主持者对上海补考日期不断推迟，确有出于想要延揽更多学生的考虑。

军校第一期在广州采取公开招考方式于3月27—30日举行，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考试场地，“国文试题由戴季陶拟定，数学试题由王登云拟定。各地投考的学生共1200余人”^⑥。廖仲恺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具体谈道：“粤考军官学生千二百余人，除粤籍外，湘、桂、赣、闽、滇等省数百人，中有三分之一青年，曾经毕业中学及专门，故试题于国文、算术外，加三角、几何、代数三种，以便较别，泌勘验体格。艳考试，各题全做者为数不少，定额太隘，去取甚难。”^⑦黄埔一期生的宋希濂回忆道：“三月二十九日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参加考试，一进场，我愣了一下，竟有这么多的人参加……我到广州后，在这两三个月中，阅读了孙中山的一些讲演，特别是国民党改组后发表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曾读了又读，基本上领会了这些文件的重要意义，我就根

^① 河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三）》，1924年3月19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第73页。

^② 河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三）》，1924年3月21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第73页。

^③ 陈果夫编著：《小意思集》，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319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1887—1926）》，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1887—1926）》，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⑥ 陈宇编著：《黄埔军校年谱长编》，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1887—1926）》，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据这些文件的精神，结合试题加以发挥，至于其他如数学、历史、地理等，我都考得一般。”^①

1924年4月28日，军校第一期学生以考试成绩择优放榜。经两次考试斟选录取，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20人，后又增加26人，累计录取496人，号称500学生。^②张隐韬名列其中。5月，学生入校编队，正取生编为第一、二、三队，备取生编为第四队。张隐韬被编入第二队。^③

二、学习课程

军事教育是军校课程学习的主干和基础。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注重实地演练以及对新式武器装备的学习和使用，体现了重视实战训练的宗旨。当时有报纸介绍：“军事教育，由李济深师长主任，分战术、应用战术、就地战术、教练、兵器、军制、地形、筑城、交通、卫生等科，各科主任教官，均为国外国内士官学校及大学毕业且久经实战之专家。此次军官训育之方法，在吾国实为破天荒。”^④整体而言，军校第一期学生的军事教育课目包括学科和术科：学科即军事理论，讲授步兵操典、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军制学及射击教范等军事理论；术科为军事技术，开设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以及行军、宿营和战斗联络等课程。张隐韬日记中记载了军事课程的具体教学状况：“今天上班时，讲‘兵器’的教员说：近日战器发明，日新月异。近报上载有英国某人，新发明一种光线利器，无论飞机、人马等，凡被其光线之当照者，飞行机即可堕地，人马即可死亡，已在实试中。如此等战斗利器果能有效而实施于战场上，则将来世界战争，另有一种变化。上午，考战术学。”^⑤

张隐韬记下了实弹射击操练时的感受：“我们今天的术科是减药射击，每人发给三粒子弹，望着五十米达距离的木把〔靶〕去射击。我打了三枪，只中了一枪于三环的把〔靶〕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放枪，在未射之前，以为枪的坐力很大，尚惴惴有点不敢放。然在实射之后，才知以前的设顾虑太过了，何尝有那种恐怖之实在里边？”^⑥根据张的记述，当时军校的课业和训练量相当大：“今天的功课已更换课表授课，上午四点的学科，下午四点的术科，晚上还有二点的夜间演习。”从早到晚，加夜间的实地演习有十个课时，一天下来，张隐韬“手足困乏，举止无力”。^⑦这样的状况，在军校实属常态，当时报载：“自开始授课以来，自蒋校长以下全体教职员，都是在早晨五点钟起，直到晚上十二点钟，继续工作。学生每天连操练带学科，亦在十小时以上。”^⑧

实地演练对体力是严峻的考验，是军校学员必须经历的训练。相比之下，张隐韬似乎更希望能更多地学习军事理论，提高军事素养，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今日起，本校术科减少，每天有六点钟的学科，惟星期六有一天的野外，这是体操，不若以前之苦了。并且昨日日本校党部成立，校长

^①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② 陈宇编著：《黄埔军校年谱长编》，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③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504页。

^④ 《军官校之认真》，《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30日，第6版。

^⑤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7月4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1页。

^⑥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7月17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3页。

^⑦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7月2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0页。

^⑧ 《军官校之认真》，《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30日，第6版。

说：‘我们在党部未成立以前，是取严格的手段来锻炼同志。今后，我们是以感化力来补〔帮〕助同志。……’本校以前的劣技，或者能去一点。那么，我们求军事学的时机算是到了，可庆的很！”^①

地形学亦是军事教育的重点。张隐韬记道：“今天我们都实习野外测图……所测的系道线法、交会法二种。虽是很简单的题目，因为人数多、时间长，劳苦得很，但精神到〔倒〕也愉快”^②；“今天还是地形作业的野外实习，利用昨天以交会法、道线法的几何图，而为实写地物地貌的要图”^③。地形学还被列为专门的考试科目。^④

与当时各地开办的军事学校不完全一样，黄埔军校的训练除军校必修的军事学科外，还有大量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当时，“**政治部科目，分《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国民党政纲》《各国革命史》《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之土地及劳动问题》等科。**由胡展堂、廖仲恺、戴季陶、邵元冲、张申府诸君分担教授。教授方法，用集合训育及分组实习两种”^⑤。邵元冲作为政治教官，负责讲授各国革命史，他的日记记载：“余所任之各国革命史，共计授课八小时，每星期一次，星期四午前十时至十一时为授课时间，自下星期起授。”从课程设计看，几乎涵盖了世界各国主要国家的革命运动发展史。^⑥张隐韬日记中也写下了听课的感受：“今日有某先生继续前次讲演《世界革命史》之法国及德国的革命，我坐在讲堂之最后地，听不清楚，不能将其次序写出。”^⑦

强调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讲授，不仅是黄埔军校当局的立场，也是学生的要求。张隐韬日记中写道：“近见上课已久，而政治、经济、外国语诸科尚不见实行教授，特将我这个意见写在本班的意见陈述簿上，向教授部质问。但不知能否发生效力。”^⑧正因为学校上下通力合作，军校教育成效显著，“只学习六个月的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比之后来学习三年的各期学生，在军事才能上是毫无逊色的”^⑨。

张隐韬还记录了生活日常。军校有微薄的薪饷发放，“晚间发饷，每人十五个广东毫子”^⑩。发饷后，张隐韬和同伴外出游玩、享受当地美食。^⑪这是紧张的军校学习之余难得的休闲时光。

三、分化与斗争

黄埔军校自开办后，即呈现许多新气象。张隐韬则从学生视角，反映出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既往关于黄埔军校的研究中恰是常常被忽略的。

^①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7月7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1页。

^②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7月31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5页。

^③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8月1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5页。

^④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7月5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1页。

^⑤ 《军官校之认真》，《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30日，第6版。

^⑥ 王仰清、许映湖整理：《邵元冲日记》上，1924年5月31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8页。

^⑦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6月26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0页。

^⑧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6月30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0页。

^⑨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合编：《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

^⑩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6月28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0页。

^⑪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6月29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0页。

黄埔军校设立政治部，负责政治教育。政治部的政治教育不是单纯的灌输，而是强调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互动。政治部设立质问箱，“凡学生关于主义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有疑问时，可投函于质问箱，每星期一日开箱，检查各质问函件，由主任教授，分别以书面或口头，答复质问者。此种设备，目的在引起学生之研究与兴趣，使讲义不致偏于注入式，亦为有意义的设备也”^①。张隐韬日记中记载了政治部活动的情形：“晚间政治部的小股开会，讨论的问题是：‘今日三民主义的障碍是什么？’”^②军校政治部向学生征求政治讨论的题目，张隐韬“提议的是：1、俄国革命成功与东方弱小民族今后之关系，2、广义的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比较二个题目”^③。这两个题目都涉及国民党改组的根本问题，可以看出在各方势力共同推动下军校政治工作所达到的深度。

不过，要完全摒弃当时社会尚比较盛行的军阀作派，也并非易事。军阀作风的余绪在黄埔军校还是时常可以看到。张隐韬记道：“昨日本校所发生的下级干部商议向校长要求减少伙食军装费一事，今日晨党代表及校长（党代表是廖仲恺、校长是蒋介石）遂颁布命令。谓：第一队队长吕梦熊，派充执行官时，私开会议，要求加薪〔薪〕，实属不遵校令，违犯纪律，着即免职，永除党籍。”紧接着，张隐韬写得更清楚：“今日上午队长说：‘校长命令，关于下级干部的事，学生是不准提出质问。若有替下级干部说话的，官长和学生都要枪毙！……’此学校之中，发生此等压迫不平之事，真是为人争自由、为人民争平等的革命党的怪闻。”^④

张隐韬对学校管理者缺乏民主精神深感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学生有对官长不满意，给校长去了些谩骂的无名信件。校长大怒说：‘我有我作事的方针，不能因为你们学生不满意，我就可以依你们的意思革除不用。你们一定对官长表示不满意猛烈攻击时，那么，就以攻击本校长始！’所以，现在的学生——尤其是第一、二队的学生，都对学校、党的前途绝望！这真是一种极不好的现象。”在张隐韬看来，一个“新的适合潮流的学校”，“官长及其他管理人物，更须一致刷新，才可以上下一致，和和霭霭〔蔼蔼〕、协力完成革命，如苏俄赤军之组织然”。^⑤以这样的标准衡量，蒋介石表现出的独断专行，显然与张隐韬的期望存在很大的差距。

一些得到校方赏识的学生也让张隐韬侧目，如当选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执行委员的中共党员李之龙曾对正与同学玩闹的张隐韬说：“你们这样打仗，我是不许，只在你说你是民党〔党〕员，我就有管你们的权力！”这让张隐韬很是厌恶：“素日里，官长从未说过这样强蛮无理的话，竟在他这小毛孩拿出狗委员的架子来望〔对〕我们使用。中国人的这种心里〔理〕，岂不可恨？”^⑥

不过，张隐韬的判断也有其主观立场，他更多的是站在学生角度看问题，有时难免偏颇。比如当他在日记中痛骂李之龙时，却也提到军校管理者从未说过这样强蛮无理的话，而李之龙所说的只要是党员就可以管，细究起来，也还是在国民党和军校的宗旨之内，只是其态度有些居高临下。这就提示，学生的角度固然可以参考，但也不能以偏概全。

^① 《军官校之认真》，《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30日，第6版。

^②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7月12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2页。

^③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7月9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2页。

^④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6月25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69~70页。

^⑤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五）》，1924年9月3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第79页。

^⑥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7月18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3页。

为加强政治工作，黄埔军校成立了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张隐韬记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首次活动的状况：“党代表报告：本校组织特别区党部，以各队为分党部，各队之中分若干小组，并在明日晨开会，请各同志发表自己对于组织上的意见。”^①选举党部成员是组建校内党组织的重要一环，张隐韬也名列其中。只是他坚定信仰共产主义，对参加国民党的组织活动并不热衷。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来这学校并不是为主义活动而来，我是为主义预备而来，也就是要作我的那个伟大的一劳永逸的运动，这步是我应走的过程。”^②这里透露的是他作为中共党员的心态，颇值得重视。在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下，张隐韬在填写入学调查表时，“入校目的”一栏也会填上：“为达三民主义建设之目的，而欲从军事行动，故入本校。”^③这是典型的“国共实行‘党内合作’初时的一般革命话语”^④，但中共党员对自己信仰的认同还是深刻烙印在内心。

由于选举对大家还是一个新鲜事，最初尝试选举的人们闹出不少笑话：“今天选举的情形，真是笑话，投票时有写‘石达开’、‘林觉民’、‘曹琨’及‘蒋中正的雇佣人’；茅延桢写成‘毛益蒸’等等字样。并且各人选举，胡写一气，未曾用观察力考试一翻，再来写上。所以，选出的人，尽不是我意中的作事人。”对此，张隐韬大为愤怒，甚至表示：“假设此校系我主持，欲希望本党的成功，必要清理内部，将全体学生大加淘汰，虽革去大多半，亦所不息〔惜〕。不然，何望党的成功？”^⑤蒋介石对选举出现的这些乱象也非常不满，批评道：“昨天开选举会的时候，不是有一二个人在票上写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这件事本来是个人的道德，本校长可置之不管，但在会场上有这一椿〔种〕不好的现象，就是我们学校不幸的表现。”^⑥

政治工作进入学校，相应的，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和分化，军校内部的政治争斗也趋于激烈。首先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发难。张隐韬记道：“近见报载，谓李石曾南下，劝告无政府党与国民党合作。我以为这种谣传实在靠不住，中国有几个无政府党？无政府党有什么组织？李石曾南来劝告谁？真是笑话！上海、天津、北京的无政府党，已是瓦解，各奔各人的面包去了。凡是有志愿急进的，差不多都已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又因中国环境的需要，都已与国民党合作。此是近时社会主义者之中国情形也。”^⑦这时，张隐韬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挑战几乎还是无视的态度。不过，一个月后他便认识到这种挑战不是空穴来风：“本校有学生熊敦，近来给校长去一信，要求退校。其理由谓：‘近来理想变迁，相信无政府主义，欲脱此校，并永远脱离党旗〔籍〕。’校长怒甚，特禁闭六天，并加以严格之惩罚，然后革除本校。因校中有无政府党人十余名，已暗中侦察。”^⑧军校召开干部会议，决定一一揭破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使之在军校中无立足之地。《蒋介石年谱（1887—1926）》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我叫他来，问他要退学的理由，他说他是因为思想变更，所以要求退学。我问他变更的什么思想，他说他近来相信无政府主义了。我又问他相信无政府主义，是从什么时候起的，

^①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6月28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0页。

^②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7月2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0页。

^③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504页。

^④ 曾庆榴：《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⑤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7月3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1页。

^⑥ 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黄埔丛书·精神教育》，1925年内部编印，第88～89页。

^⑦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7月16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3页。

^⑧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8月5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6页。

在进本校以后，还是在进本校以前呢，他说是在进学校以后。……本校是三民主义的学校，为什么能使一个学生信仰无政府主义呢？因此我又问他，你相信无政府主义是什么原因，他说是外边的朋友寄给他无政府主义的书报，他看了那种书报，就相信无政府主义了。我对他说，你当初来入本校，当然是对于三民主义经过你自己的考虑相信之后，才来入党入校的。既然进了本校，你的主义就不应该变更，就不应该对于三民主义再有怀疑，这是本校明白宣布过的事。现在你自己的思想宣战，以至于行为矛盾，照本党与本校的纪律说起来，是说不过去的。但是我想他这种学生也无益，因此我与党代表商议，得了党代表许可，就准了他的告退。”^①

国民党右派的考验也颇复杂。1924年6月中旬，张继、谢持、邹鲁、邓泽如等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反对共产党的所谓“弹劾案”，这必然影响到军校，张隐韬记道：“近日民党中央发生内部左、右派之争执，张继、谢持为右派中之反对共产党及民党之倾向此主义的尤甚者。戴季陶所以不能在广东立脚（他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宣传部长及本校的政治部主任），而去上海，就是这个缘故。……季君系革命之必要彻底者，无论民党和什么段、卢及旧势力联合，他都是不赞成。”张隐韬认为，戴季陶的出走是“因为他的宣传部的部员多是共产党，故引起右派之反对，而走去上海。先生之心，亦良苦哉！”^②此时，在张隐韬心目中，戴季陶还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是被右派逼迫出走。一年之后军校办的杂志中也说，戴季陶的出走，是因为和张继等“为争持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军校”^③。这些观察反映的是历史当事人当时的认知。事实上，国民党的左右派本来也是动态演变的，不久，邵元冲接替戴季陶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他的日记中对此事之经纬有所记载^④；而张隐韬为之抱不平的戴季陶，1925年六七月间即以个人名义抛出反对国共合作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

四、对商团事变的观察

黄埔军校开办后，黄埔学生军打的第一仗是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张隐韬的日记留下了对商团事变初期的详细记载，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共产党人眼中的商团事变。

广州商团成立于1912年，原是商人的自卫组织。1919年陈廉伯继任广州商团团长后，商团势力迅速扩大，“商团在省城者，原有十团。此次战争，在河南之第十团，未克集中，合计九团共三千八百余，连后备约六千人”^⑤。1924年5月，“商团聚议联防时，密谋扩充实力，公举陈廉伯以一百万元托丹麦商行，购步枪五千，短枪四千，子弹二百余万发”^⑥。商团势力之盛，由此可见一斑。8月上旬，广州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步枪4850杆，配子弹115万颗，驳壳手枪4331杆，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1887—1926）》，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

^②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7月20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3~74页。

^③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④ 王仰清、许映湖整理：《邵元冲日记》上，1924年5月19、20、22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5、26页。

^⑤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20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页。

^⑥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20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0页。

配子弹206万颗。又大小手枪660枝，另配子弹164200颗”^①。这些枪械偷运广州，孙中山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予以扣留，并下令通缉商团团长陈廉伯、副团长陈恭受。陈廉伯闻讯逃往香港，指使广州商团以罢市威胁广州国民政府。到8月25日，在商团的煽动下，广东全省有100余处罢市。9月14日，广州商团酝酿第二次罢市。

从张隐韬的日记可以看到关于商团事变的追踪记录。商团初显对抗时，张隐韬在日记中写道：“商团非法的这种私购军火的行动，可说是无法无天，应有相当的手续〔段〕惩办之。然其骨子〔里〕的原因，不能不说是因为他们对孙总理的民生主义不满，而武装联合起来为政治上之行动。”对此，张隐韬从共产党员的立场出发，主张坚决镇压：“主持阶级调和、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孙中山，反为资本家所反对。何若明明白白的表明态度，代表无产者，与此麻木不仁的资本家决战，以完成一劳永逸的彻底革命！”^②在共产党人看来，商团之所以敢于如此挑衅，关键在于麇集在广州的大小军阀和他们沆瀣一气，周恩来在商团事变尘埃落定后曾说：“扣械事件的调停，粤滇两军阀均想藉此与商人接近，见好商人，然后从中剥夺。”^③对于这一点，张隐韬也有类似的判断：“前日发生之购械案，许崇智及其他武人，均派人向大元帅或直接来本校索枪械及子弹。这种目无师长、自私自立的军队不法之行动，非全体解散之不足以定粤之局，而完革命之实。此亦革命政府之目前障碍也，对付北洋还是第二步的问题。”^④

商团发起对抗后，无论是滇军范石生还是粤军许崇智，孙中山都很难真正依靠，而只有黄埔军校方堪倚重。张隐韬8月12日记道：“大雨骤作，我亦正值警戒之际，水深数寸，行动时皮鞋为水浸入，枪亦湿。本校乃命三、四队学生脱去军衣，载〔戴〕上雨笠搬运，至十二时乃止。……我在夜间警戒时，那种暴烈的风雨，要说是辛苦得很，但我认为国民党得这大批军火，诚是前途的幸事，高兴得很，故毫亦不觉苦！又，夜晚用的口令：是‘得威必胜’四字，也表示国民党得这批军火而欢〔喜〕出意外的意思。”^⑤

从此，黄埔一期的教学训练与解决商团事变联系在一起。军校教育明显向着备战方向发展：“上午校长说话，并讲‘巷战’”^⑥；“上午作工事，下午现地战术。这几天来，我们的吃饭、睡觉、上课时间都失常序，每夜都是严密警戒，惟恐本地之土匪、乡团、商团之暗谋劫械”^⑦。8月19日，黄埔学生以实习巷战之名开往广州市内，严防商团军反抗：“我们去，也是为的备战。全副武装，充分子弹，而实习‘巷战’者也。”^⑧20日，学生军“列队西关游行，并散三种传单，以劝告市民。看其形势，近日似无有什么变动，因其迫于强威之下也。但恐祸变不发于近日而仍暴发于将来，因其商团军有千余名（他商人枪械颇多），不使之解散、缴械或改组（改组用民党人指挥之），必是起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孙中山镇压广东商团叛乱文电》，《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第47页。

^② 河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8月14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8页。

^③ 伍豪（周恩来）：《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向导》第92期（1924年11月19日），第772页。

^④ 河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8月15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9页。

^⑤ 河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四）》，1924年8月12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8页。

^⑥ 河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五）》，1924年8月19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第72页。

^⑦ 河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五）》，1924年8月27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第74页。

^⑧ 河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五）》，1924年8月19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第72页。

祸之源”^①。

1924年8月底，商团事件愈演愈烈。31日“午前，孙总理及许崇智等来校，下午返省。闻为商潮及所扣之军械有关，但不知其内容”^②。9月1日，张隐韬得到更为详细的讯息：“昨日孙总理来，纯为扣械的事件。因为商团的罢市风潮无法解决（老孙无魄力，何尝无法解决？），并因商团请范石生（滇军的官长）及廖什么师长调和，令滇军都移到西关里去。无论什么军队去，他们都开枪就打，惟不知不法的商团给了滇军多少的利益？糊里糊涂的拟定了解决的条件，叫孙总理照着这个条件来做，不然滇军即与商团一律行动。……孙总理迫于不得已，所以昨来校商议交还的手续。闻说蒋介石是很不赞成的。”^③

张隐韬记载的“解决的条件”，系指滇军与商团达成的六项条件。^④对于向商团作出妥协，张隐韬非常不满，批评孙中山缺乏魄力，认为国民党将因此颜面扫地。^⑤张隐韬不仅把商团事件视为地方商人对广州革命政府的挑战，更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争斗。张隐韬发现：“南方的人民是较北方的人民有点知识，所以他们（南方人民）的团体的结合也比北方‘快’而且‘早’。固然无产阶级的团体是成立已不算少，而同时资本家的结合也是很迅速，无产者与资产者团结势力之对垒，正是适为正比例。”^⑥

张隐韬讲到的“无产阶级的团体”，广东工团军的成立可以说是一个重要标志。工团军1924年8月在广州成立，“他们开始组织，就是由于商团之罢市起。通电拥护政府，与商人立于对抗之地位”^⑦。工团军由广州工人代表会指挥，实际是中共通过工会掌握的一支工人武装，黄埔军校学生负责工团军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不过，张隐韬也从工团军中发现一些隐忧：“他们的组织之内容，当然叫我们不满意的地方很多。并且，广州的工团，都是有名无实的空招牌。他们的领袖，都是些本地混民之风头将。凡一次的游行，他们总是穿着很漂亮的洋服，还持着指挥棍，简直不象个无产者模样。”^⑧张隐韬的观察，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阶级立场和理想追求。

遗憾的是，在商团和广州革命政府对抗日趋激烈时，张隐韬的日记在1924年9月份戛然而止，没能呈现黄埔学生军和商团对抗的全貌。后来的历史是，10月10日，商团枪杀游行群众的“双十惨案”发生后，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支持下，成立革命委员会，采取断然措施，下令镇压了商团叛乱。张隐韬一直主张的强力镇压最终得以实现。

^①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五）》，1924年8月20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第72页。

^②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五）》，1924年8月31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第77页。

^③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五）》，1924年9月1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第77~78页。

^④ 公侠：《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右派共同宰割之下的广州革命政府》，《向导》第82期（1924年9月10日），第663页。

^⑤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五）》，1924年9月1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第78页。

^⑥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五）》，1924年8月28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第75页。

^⑦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五）》，1924年9月2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第78页。

^⑧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五）》，1924年9月2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第78~79页。

五、余论

张隐韬是早期中共党员。他在黄埔军校的日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作为共产党人的革命立场。然而，他的日记并没有留下关于中共在黄埔军校内的活动记载。1924年9月，军校内的中共党员就成立中共黄埔支部，由蒋先云任书记，杨其纲任组织干事。张隐韬应该参与了中共组织活动，或许是出于组织纪律，有意识地予以保密，才将这些内容刻意隐去。正如有学者注意到，张隐韬日记“对党内的一些情况有所记述，只不过是有时使用了曲折、隐晦的语句罢了，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一些与党的活动有关的蛛丝马迹来”^①。

从张隐韬的日记中，能够真切看到一位共产党人对自己投身的革命事业的热忱，也通过当事人的“在场经验”再现了黄埔军校自开办、成型乃至发展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和艰难。这种自下而上的学员视角，对于之前相关研究多为自上而下的俯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弥补的作用，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黄埔军校初建时期的历史，也折射出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丰富的历史面相。早期中共党员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历程在张隐韬个人的这段经历中亦得到更直观具体的呈现。

[石慧，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何飞彪)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Student: an Examination with *Zhang Yintao's Diary* as the Centre

Shi Hui

Abstract: As a school of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Cooperation,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WMA)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advancing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Zhang Yintao, a student in the WMA's inaugural class and an early member of the CPC, meticulously documented the recruitment of early WMA students and other early CPC members in his diary. His diary also provided insights into his studies, training, daily life at WMA, and observations of the Canton merchants' corps incident. Zhang Yintao's diary was a valuable historical source that offered a unique perspective on how the WMA was perceived by one of its students with CPC membership.

Key words: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Zhang Yintao; the first Kuomintang-Communist cooperation; the Canton merchants' corps incident

^① 曾庆榴：《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